

# 桐城派初期方世舉論詩宗杜、韓及 緣由——兼論其開桐城詩學師法之先

鄭宜娟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 提 要

桐城派為清代文學流派大宗，歷來多視桐城初祖方苞創立文論而不工詩，詩論則須至姚鼐及弟子方東樹始有發展。然而，與方苞皆屬桐城派初期的族弟方世舉、方貞觀即以詩名世，又各自撰有詩話收錄於《清詩話續編》。其中，方世舉結合桐城原有的尊杜思想一併推舉韓詩，先行於後來的桐城詩學。只是目前對方世舉的討論較少，亦未見有專文涉及其具體宗杜、韓之脈絡與背後成因，乃至對桐城詩學的影響都還有探究空間。

本文根據方世舉《蘭叢詩話》及其相關詩學著作，透過文本爬梳和比對可知，方世舉基於尊唐尊杜之核心思維，藉由並論杜、韓二家之新創，提升韓愈之詩壇定位，更連帶關注孟郊、盧仝、李賀等獨特的奇險詩人。至於方世舉詩論之形成，早在童蒙即受桐城方家詩法宗杜的薰陶，不過相較同輩族人僅提倡尊杜觀，方世舉則因個別受業於清初大儒朱彝尊，加以當時正值中、晚唐及宋詩之熱潮等，使方世舉在尊杜之餘，亦注意到韓愈與奇險派之價值。此外，方世舉宗尚杜、韓二家，在提點學杜路徑、高舉杜、韓五古與絕句等具體面向上，均可謂開桐城詩學師法之先。是以透過本文研究，應有助於補充桐城派初期之詩學觀，進

而窺見其建立成因及與桐城後學之關聯。

**關鍵詞：**方世舉 杜甫 韓愈 《蘭叢詩話》 桐城詩學

# 桐城派初期方世舉論詩宗杜、韓及 緣由——兼論其開桐城詩學師法之先

鄭宜娟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 一、前言

清代桐城派以古文夙負盛名，自清初方苞（1668-1749）、劉大櫟（1698-1779），乾、嘉時期的姚鼐（1732-1815）為桐城三大家。初祖方苞乃桐城文論奠基者，詩歌則非桐城派初期的著力點，一如朱則杰所述：「桐城派古文的開山大師方苞，在查慎行的指點下『揚長避短』，專門致力於古文創作；稍後的劉大櫟，平生也不甚工詩。」<sup>①</sup>張健亦以為：「桐城三大家中方苞不作詩。」<sup>②</sup>故歷來研究方苞專論古文而甚少論詩，<sup>③</sup>乃至復旦大學2018年所輯《方苞全集》僅錄其古文著作。<sup>④</sup>至於桐城詩學的發展，又如張健指出：「在詩歌創作上真正有

① 朱則杰：《清詩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329-330。

②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639。

③ 雖亦有學者如廖素卿《方苞詩文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三章「方苞之詩」分析其現存35首詩作（頁97-147）。不過據方苞弟子劉大櫟記載：「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寧查慎行，查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為文力，不如專為文。』侍郎從之，終身未曾作詩。」見（清）方苞：《方望溪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集外文卷9，頁392。方苞僅止於年少作詩，其創作量極少，是以如正文所引朱則杰、張健等人主張方苞詩不能工，本人亦無心於此，現有研究也傾向如姚翠慧《方望溪文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僅聚焦於方苞之文章創作及理論。

④ （清）方苞撰，彭林、嚴佐之主編：《方苞全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為

一定影響的是姚鼐。……真正建立獨特的桐城派詩學的是方東樹。」<sup>⑤</sup> 趙建章也認為：「姚鼐主張詩文一律，……方東樹是桐城派詩學的集大成者。」<sup>⑥</sup> 須至姚鼐及其弟子方東樹（1772-1851）始確立桐城詩學。

然而，當方苞揚長避短而不作詩，其族弟方世舉（1675-1759）、方貞觀（1679-1747）各有《蘭叢詩話》、《輟鍛錄》等詩論，均見於《清詩話續編》。<sup>⑦</sup> 再者，如方世舉所云：「余家傳詩法多宗老杜。……兄（方苞）以文勝而詩居功半。」（頁 772）指出桐城方氏以杜甫（712-770）為宗，方苞之古文成就亦得力於此，呼應方世舉自言：「今日學唐，惟當學杜。」（頁 771）以及方貞觀所謂「應手稱心，得未曾有，便可震驚一世，子美集中，在在皆是」<sup>⑧</sup> 之尊杜觀。此外，方世舉又以《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聞名，<sup>⑨</sup> 乃至有「酷嗜」韓愈（768-824）詩之評，<sup>⑩</sup> 可見桐城派初期之方苞雖不工詩，但當時的桐城文人仍有具體詩論及推崇詩家。

方世舉所宗尚之杜、韓二家，又正是後來桐城派的師法對象，如方東樹即是：「明確標舉北宗的審美標準和審美理想，這標志著桐城派詩學特色的完全

---

安徽省桐城派研究會所輯方苞著作，包含《周官集注》、《禮記析疑》等經傳論述共 13 冊。

⑤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頁 639。

⑥ 趙建章：《桐城派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頁 185。

⑦ （清）方世舉：《蘭叢詩話》，收於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頁 767-785。此書為主要文本，以下隨文標註頁碼。（清）方貞觀：《輟鍛錄》，收於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頁 1931-1946。

⑧ （清）方貞觀：《輟鍛錄》，頁 1944。

⑨ 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備受後世讚揚，如清人王鳴盛稱許：「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二卷，編年為次，最有條理。」見氏著，迮鶴壽參校：《蛾術編》，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115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76，頁 28。以此本最是條理清晰。章學誠亦云：「桐城方世舉扶南氏，撰《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二卷，……攻韓集者不可不備之書也。」見氏著：《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 年），卷 13，頁 26。視為讀韓詩不可或缺者。

⑩ 此據方世舉之姪方觀承為其集序曰：「家息翁先生博學篤行，……晚年注韓，遂酷嗜之，長篇蕩謫，不復斤斤繩墨。」見（清）方世舉：《春及堂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3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卷前序，頁 1。

顯現和詩學理想的最終形成，而北宗審美理想的代表就是杜韓詩風。」<sup>11</sup> 甚至桐城詩學整體均以杜、韓為審美理想。再如王英志等人綜論：「桐城詩派的唐宋兼宗，就主要體現在以唐之杜、韓，宋之大家為主要宗尚對象。」<sup>12</sup> 桐城詩學以杜、韓為宗而兼融唐宋。是以蔣寅上溯方世舉提出：

方世舉更發展了韓愈研究，而且與杜詩相接合，……開啟了桐城詩學並宗杜、韓的師法宗旨。<sup>13</sup>

將方世舉置於桐城詩學宗杜、韓的先導地位。只是，若說方世舉有意宗杜又提倡韓詩，具體如何接合？成因又為何？都值得再進一步探討。

目前學界對於方世舉的研究，多集中於《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sup>14</sup> 少數論及《蘭叢詩話》者，如蔣祖怡〈讀《蘭叢詩話》〉評方世舉見解獨到、兼容並蓄之優點，但不乏誤植等小疵。<sup>15</sup> 涉及方世舉之詩論與桐城派者，如蔣寅〈方氏詩論與桐城詩學的發展〉，概論繼承家學之方世舉、方貞觀、方觀承（1698-1768）尊唐尊杜，點出方世舉有另宗韓愈之現象。<sup>16</sup> 程沖、方盛良〈論桐城方氏

<sup>11</sup> 趙建章：《桐城派文學思想研究》，頁 235。

<sup>12</sup> 王英志主編：《清代唐宋詩之爭流變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年），頁 479-480。

<sup>13</sup> 蔣寅：〈方氏詩論與桐城詩學的發展〉，《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2 卷第 6 期（2014 年 11 月），頁 691-692。

<sup>14</sup> （清）方世舉著，郝潤華、丁俊麗點校：《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郝、丁亦撰〈方世舉及其《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 27 卷第 3 期（2010 年 5 月），頁 1-5；丁俊麗：《方世舉及其「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08 年）；丁俊麗：〈論方世舉的韓愈詩歌批評觀〉，《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 33 卷第 6 期（2016 年 11 月），頁 1-5。又如李小雨：《「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12 年）；鄭丹：《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研究》（成都：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2018 年）等，多集中方世舉及其韓詩箋註。

<sup>15</sup> 蔣祖怡：〈讀《蘭叢詩話》〉，《杭州大學學報》第 20 卷第 2 期（1990 年 6 月），頁 99-102。

<sup>16</sup> 蔣寅：〈方氏詩論與桐城詩學的發展〉，頁 689-696。

的杜詩觀》，梳理先祖方拱乾（1596-1666）、方文（1612-1669）提倡註杜，到方世舉、方貞觀評杜，再到方東樹結合義法解杜等。<sup>17</sup>可知學界已論及桐城方氏之宗杜，但在方世舉為何並尊杜、韓，以及與後來的桐城詩學之關聯，都還有探究空間。

因此，本文將基於前人研究，以方世舉晚年集其論詩精要之《蘭叢詩話》為主，輔以能體現其治學精勤之《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等著作。先是闡述方世舉之尊杜觀到融合韓詩，進而提高對韓愈一派之評；接著分析方世舉乃受到家學、師從、時代等影響其詩學觀；並延伸探討方世舉與桐城後學之連結。期能有助釐清桐城派初期之詩論及背景，以見桐城詩學宗尚杜、韓的建立基礎。

## 二、方世舉論杜、韓詩

方世舉，字扶南，號息翁，安徽桐城人，歷經康、雍、乾盛世，博學篤行，工詩，為桐城初祖方苞之族弟。歷來多以桐城派初期不工詩論，但方世舉不僅著有《蘭叢詩話》、《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方扶南批本李長吉詩集》等，並極力推崇杜甫、韓愈及相關詩人。以下即分別闡釋之。

### （一）尊杜觀

方世舉晚年集學詩精髓之《蘭叢詩話》，總計 66 則有 35 則與杜甫有關。《蘭叢詩話》除了前 3 則為治學背景與編纂經歷，方世舉論詩即開宗明義曰：

詩屢變而至唐，變止矣，格局備，音節諧，界畫定，時俗準。今日學詩，惟有學唐。唐詩亦有變，今日學唐，惟當學杜。（頁 771）

首先，方世舉基於「變」，指出唐詩在體裁、音韻等各面向均臻至成熟，為詩歌

<sup>17</sup> 程沖、方盛良：〈論桐城方氏的杜詩觀〉，《滁州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3 期（2022 年 6 月），頁 57-62。

發展之集大成；又以杜甫將唐詩之形式內容推至極則，故而標舉「學唐」乃至「學杜」之最高典範，體現了方世舉尊唐而尤尊杜甫的詩學觀。

也是這種「學唐」、「學杜」之指導學習的立場，方世舉唯恐初學無法直抵杜詩堂奧，故又就不同詩體分別補述：

登高自卑，宜先求其次者，以為日漸之德。五古五律先求王、孟、韋、柳，七古歌行先求元、白、張、王，庶有次第。（頁 771）

如同前人於五言尊杜甫為大家，王維（693-761）等人僅為專擅某一風格之名家或接武，<sup>18</sup> 方世舉也基於這種層級劃分，以五古、五律可先從次階之王維、孟浩然（689-740）、韋應物（737-792）、柳宗元（773-819）入手。七古一體則以元稹（779-831）、白居易（772-846）、張籍（772-830）、王建（765-830）進階至杜詩，一如方世舉所謂：「古樂府必不可仿，……杜則自為新題，自為新語，元、白、張、王因之。」（頁 773）像是杜詩〈兵車行〉、〈哀江頭〉等自創新題樂府，帶動元、白等人新樂府運動，均可見方世舉指導「登高自卑」，乃以杜甫為終極理想。

至於唐代新創之七律，相比五言詩因發展較早，故五律亦受南朝影響，方世舉先是論七律：「其體最時，其格最下，然卻最難，尺幅窄而束縛緊。」（頁 773）此體乃初唐因應朝廷應制而生，格律繁瑣又須以高華典麗為則，在種種不易施展的前提下，方世舉盛讚杜甫：

<sup>18</sup> 如明人高 《唐詩品彙》於五古、五律皆尊杜甫為「大家」，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之五古只為「名家」，而在五律雖列王、孟為「正宗」，但其曰：「孟襄陽興致清遠，王右丞詞意雅秀，……皆開元、天寶以來名家。」見氏著：《唐詩品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五言律詩敘目，頁3。仍以王、孟為各有偏重之名家，韋應物、柳宗元則僅列「接武」。一如胡應麟論唐人五律有二格：「王孟儲韋，清空閑遠。……唯工部諸作，氣象崑峨，規模宏遠，當其神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還，一人而已。」見氏著：《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內編卷3，頁58。以王維等人僅為清遠一端，杜詩多變乃千古一人。

能不受其畫地濕薪者，惟有老杜，法度整嚴而又寬舒，音容郁麗而又大雅，律之全體大用，金科玉律也。（頁 773）

就七律固有的臺閣體制，杜甫既有嚴謹如〈紫宸殿退朝口號〉、〈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富麗渾雅，又有不墨守成規的田園家常之〈江村〉、詠史寄興之〈詠懷古跡〉等，或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打破近體格律不重字等，<sup>19</sup> 開拓七律漸趨固化的內容形式，實可謂後世金科玉律。這種將新創詩體再行變化，也呼應方世舉以「唐詩亦有變，今日學唐，惟當學杜」之崇杜。

方世舉又基於杜七律「初學不能驟得，且求唐人之次者以為導引」，提出：

如白香山之疏以達，劉夢得之圓以閎，李義山之刻至，溫飛卿之輕俊，此亦杜之四科也。（頁 773）

借「孔門四科」舉杜甫為宗主，以中唐白居易之流暢通達、劉禹錫（772-842）之扣題推展；晚唐李商隱（813-858）之指斥嚴苛、溫庭筠（812-866）之從容俊雅為輔翼。也正是「杜之四科」風格各異，方世舉提點：「執中無杜之權，亦與如白如李如溫各偏一長者何異。」（頁 779）揅合「四科」方為宗主，既見杜甫變幻萬千之渾融功力，亦印證杜詩實為「律之全體大用」。

可知方世舉賦予杜甫古詩、律詩無上尊位，至於絕句詩體，歷來詩評家往往以李白（701-762）、王昌齡（698-757）為「聖手」，<sup>20</sup> 於杜詩或難以認

<sup>19</sup> （唐）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清人楊倫評曰：「兩『峽』兩『陽』作跌宕句，律法又變。」見氏著：《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9，頁433。

<sup>20</sup> 如明代王世貞曰：「七言絕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五七言絕，太白神矣。」見氏著：《藝苑卮言》，收於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4，頁1005-1006。許學夷亦云：「太白五七言絕，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七言絕，太白、少伯意並閒雅，語更春容。」見氏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辨體》（北京：人

可，<sup>21</sup>或另為一格。<sup>22</sup>對此方世舉亦先指出：「五七絕句，唐亦多變，李青蓮、王龍標尚矣。」（頁 779）肯定李、王絕句，後又提出：

杜獨變巧而為拙，變俊而為傴，後惟孟郊法之。然傴中之後，拙中之巧，亦非王、李輩所有。（頁 779）

絕句本應婉曲含蓄一唱三嘆，杜甫卻刻意以樸拙粗鄙之筆，乃至如〈三絕句〉淺白而略帶滑稽，反使其所傾訴者更具張力；<sup>23</sup>又如絕句講求一氣呵成毋須對仗，但如杜甫〈絕句四首〉之「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江畔獨步尋花〉之「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等名句，<sup>24</sup>即有「卒章俱作對結，非絕句正體」之評，<sup>25</sup>看似是杜甫不諳格律，方世舉卻以此「非正格」再次強調杜甫不同於王、李之刻意創變，將杜詩提升至諸體兼善之聖境。

---

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卷 18，頁 205-206。乃至清人葉燮綜述：「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見氏著：《原詩》，收於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外篇下，頁 610。可見李白、王昌齡被視為絕句聖手。

<sup>21</sup> 如明代胡應麟曰：「子美於絕句無所解，不必法也。」見氏著：《詩藪》，內編卷 6，頁 109。清代王士禛亦云：「工部之詩，……絕句不妨稍拙。」見（清）王士禛等：《師友詩傳錄》，收於丁福保編：《清詩話》，頁 145。均以其絕句不佳。

<sup>22</sup> 如明人胡震亨載曰：「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見氏著：《唐音癸籤》（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卷 6，頁 58。清初宋犖亦曰：「詩至唐人七言絕句，盡善盡美，……少陵別是一體，殊不易學。」見氏著：《漫堂說詩》，收於丁福保編：《清詩話》，頁 419。

<sup>23</sup> （唐）杜甫〈三絕句〉：「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殺人更肯留妻子。」明人金聖嘆評曰：「非是寫慘惡事，猶用滑稽筆，不爾，便恐粗獷，不可讀也。」見氏著：《金聖嘆選批杜詩》（臺北：德興書局，1981年），卷 4，頁 192。

<sup>24</sup>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註：《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 13，頁 1143；卷 10，頁 818。

<sup>25</sup>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 6，頁 103。

## （二）並論杜、韓

《蘭叢詩話》屢屢體現方世舉的尊杜觀，至於其另一名著《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因「友人顧俠君《箋注昌黎詩集》新出，凡宋人有說皆收之，用力勤矣。而諸說於昌黎身世，多有不合」（頁 770），有感於友人顧嗣立（1669-1722，字俠君）註韓多訛誤，方世舉是以鑽研韓詩。此箋註本應以韓愈為主角，不過方世舉在卷前自序則曰：

唐詩之有可箋注者，莫如杜、韓二家。杜有《千家注》，韓有《五百家注》，皆宋人所裒集，廣收博采，用力勤矣。然其說多有不當，辭而闕之者，已歷有之，杜《千家注》姑不論，韓《五百家注》自朱子《考異》出而遂廢。<sup>26</sup>

開頭即從唐代最值得箋釋之「杜、韓二家」展開，並以宋人註二家多有不當後，方聚焦於韓詩箋註本。顯然方世舉即便註韓，仍可見對杜詩之關注。

像這種並論「杜、韓二家」之語，在方世舉集論詩精要之《蘭叢詩話》更為常見，如其論二家七古曰：

古體皆有平仄，但非律體一定，無譜可言，惟熟讀深思，乃自得之。……七古亦多，歌行尤甚，至若杜、韓二家，有通篇對待者，益見力量。（頁 772）

方世舉指出杜、韓將唐代成熟的音韻知識，巧用於形式自由的七古，即清初汪森（1653-1726）所謂：「自少陵始變為生拗之體，而公（韓愈）詩益暢之。」<sup>27</sup>

<sup>26</sup> （清）方世舉著，郝潤華、丁俊麗整理：《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前序，頁 1。

<sup>27</sup> （清）汪森：《韓柳詩選》，筆者未見此書，轉引自陳伯海：《唐詩彙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1649。

而後趙翼（1727-1814）又舉例：「七言亦有全平仄者，少陵詩『有客有客字子美』、『中巴之東巴東山』。昌黎〈贈劉生〉之『青鯨高摩波山浮』、〈送僧隆觀〉之『浮屠西來何施爲』。」<sup>28</sup>像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夔州歌〉，或韓愈七古刻意以全句均爲平聲或仄聲字，藉由異於近體格律之突兀感，使詩歌越見力量。

再者，又如方世舉雖云：「王新城教人少作長篇，恐其傷氣，是也。」（頁774）以長篇須考量內容豐富、鋪陳得宜等，否則文氣不免匱乏難支，但下文亦云：

杜、韓二家獨好長篇，學者誠熟誦上口，如懸河洩水，久之理足乎中而氣昌於外，亦莫能自禁。余與望溪兄五古所謂「大兒李杜韓，小兒王孟柳」，言氣勢也。（頁774）

又舉杜、韓二家以扭轉「少作長篇」之說，尤其當詩評家論杜及韓往往著重七古，<sup>29</sup>方世舉認爲二家五古亦能以氣勢見長，如其著名長篇〈北征〉、〈南山〉即然；並指點後學熟誦杜、韓詩以掌握旨趣脈絡，作詩自能由內而外充溢雄偉氣勢。

既然提及韓愈古體，自不免需回應韓愈常被評價爲「以文爲詩」之說，對此方世舉亦云：

韓昌黎受劉貢父「以文爲詩」之謗，所見亦是。但長篇大作，不知不覺，自入文體。漢之〈盧江小吏〉已傳體矣，杜之〈北征〉序體，〈八哀〉狀

<sup>28</sup>（清）趙翼：《陔餘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卷23，頁474。

<sup>29</sup>如明人胡震亨記載：「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後，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見氏著：《唐音癸籤》，卷10，頁97。清初管世銘亦云：「（七古）李杜既沒，正聲訕然。昌黎崛起，始傑然復有丈夫之氣。」見氏著：《讀雲山房唐詩序例》，收於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頁1549。

體，白之〈遊悟真寺〉記體，張籍〈祭退之〉竟祭文體，而韓之〈南山〉又賦體，〈與崔立之〉又書體。他家尚多，不及遍舉，安得同短篇結構乎？（頁 774-775）

雖然同意韓愈的確「以文爲詩」，但方世舉認爲長篇大作本就容易傾向散文體裁，且爲能有力佐證詩人創作往往如此「不知不覺」，方世舉上溯漢詩〈孔雀東南飛〉，乃至舉杜甫〈北征〉之五古長篇，或是白居易、張籍等人之古詩，都有跨出詩體而近似序跋或傳記等文體者。這也說明韓愈長篇極有氣勢力量，一如方世舉引導後學熟誦杜、韓長篇之「理足乎中而氣昌於外，亦莫能自禁」，皆非簡短篇幅所能束縛者。

像這種在同論及杜、韓時，格外出言爲其平反者，還可見於方世舉談作詩之「協韻必不可用」所言：

於本韻中不得已而擄擄以便棘手，曾何合於自然之古音乎？李間有之，杜則絕無，昌黎惟用之於四言，四言宜也，是仿《三百篇》。（頁 772-773）

以押韻若轉爲旁通他韻，即脫離詩歌之自然元音，而後在舉詩人爲例時，相比同爲唐詩大家，方世舉對李白僅略述「李間有之」，未進一步解說；對杜甫則相當斬釘截鐵，直指其「絕無」此弊；至於韓詩時而用之，方世舉則強調「『惟』用之於四言」，說明韓愈乃追摹《詩經》，上古音韻與唐代有別，韓愈仿古作四言詩故不受此限。顯然就其中用語，不能看出方世舉對杜、韓二家之肯定與迴護。

方世舉並論杜、韓時對其另眼相待，也體現於二家較少受前人關注者，如同方世舉肯定杜甫絕句之創變，更稱其非李白、王昌齡所有，還接著論曰：

杜獨變巧而爲拙，變俊而爲儻，後惟孟郊法之。……退之又創新，然而啟宋矣。宋七絕多有獨勝，王新城《池北偶談》略采之。（頁 779）

除了尊杜並肯定其絕句獨特性，歷來韓愈絕句常被指為「直諧戲語耳」<sup>30</sup>、「其詩只平平」<sup>31</sup>、「多率意為之，實不足以見公本領」等不受青睞，<sup>32</sup>方世舉反倒以此為韓詩之開創性，故而當韓愈絕句備受宋人推崇，<sup>33</sup>方世舉既藉清初祭酒王士禛（1634-1711，山東新城人）《池北偶談》證明宋人絕句實為可取，亦間接鞏固韓愈絕句「創新」、「啓宋」之功。如此佳評明顯呼應方世舉所謂「唐詩亦有變，今日學唐，惟當學杜」（頁 771），不僅高舉杜甫，又稱揚同有新創變化之韓詩，還提及繼承杜詩之孟郊，體現了方世舉在重視變化的視角下，其尊杜觀又逐步向外肯定韓愈等人。只是需注意的是，相比方世舉論杜已達諸體兼善，於韓愈則僅著重其古體與絕句，透露了方世舉仍舊秉持著「惟當學杜」之尊杜核心。

### （三）兼論韓愈一派

方世舉《蘭叢詩話》明言宗杜，又屢屢可見對杜、韓二家之偏愛。此外，一如方世舉論絕句從杜甫到韓愈、孟郊等人均予以肯定，其中脈絡更明示於方世舉箋註韓詩所云：

元和以下多變調，然變不自元和，杜工部早已開之，至韓、孟好異專宗，如北調曲子，拗峭中見姿制，亦避熟取生之趣也。<sup>34</sup>

<sup>30</sup> （宋）劉攽：《中山詩話》，收於（清）何文煥：《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 285。

<sup>31</sup> （明）楊慎撰，王大厚箋證：《升庵詩話新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 9，頁 478。

<sup>32</sup> （清）程學恂：《韓詩臆說》（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卷 2，頁 39。

<sup>33</sup> 如元人劉壎記載宋人王安石與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曰：「荊公早年悟其機軸，平生絕句實得於此。」見氏著：《隱居通義》，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 11，頁 7。又據明代楊慎論韓愈〈題楚昭王廟〉曰：「宋人詩話取韓退之『一間茅屋祭昭王』一首，以為唐人萬首之冠。」見氏著，王大厚箋證：《升庵詩話新箋證》，卷 14，頁 478。

<sup>34</sup> （清）方世舉著，郝潤華、丁俊麗整理：《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盆池五首》，卷 7，頁

對於歷來以中唐詩多變調，方世舉則認為此變化早在杜甫即已體現，韓、孟等所謂的奇險詩派，只是專就杜詩之創新怪異加以深入，並以此陌生感變幻生趣。

可知，方世舉是將多所創變的奇險派上溯至杜詩，形成杜甫至韓愈、再至韓詩一派之發展脈絡，故其詩論亦不乏推崇韓愈相關詩人，如其曰：

徐文長有云：「高、岑、王、孟固布帛菽粟，韓愈、孟郊、盧仝、李賀卻是龍肝鳳髓，能舍之耶？」……余嘗因此言，而效梁人鍾嶸《詩品》，為四家品藻：韓如出土鼎彝，土花剝蝕，青綠斑斕；孟如海外奇南，枯槁根株，幽香緣結；盧如脫砂靈璧，不假追琢，秀潤天成；李如起網珊瑚，臨風欲老，映日澄鮮。（頁 775-776）

韓愈一眾中唐詩人，雖非高適（704-765）、岑參（715-770）、王維、孟浩然乃耳熟能詳的盛唐名家，方世舉卻藉明人徐渭（1521-1593）譽其珍稀如「龍肝鳳髓」，還仿效《詩品》品評，像是剝除韓詩艱澀字句，自有斑斕內裡；又以孟郊（751-814）如沉香色澤枯槁，實則幽香沁人；盧仝（795-835）詩同樣在怪奇字面下，含藏秀潤玉質；而李賀（790-816）詩之瑰麗更如珊瑚鮮豔奪目，且細究方世舉所謂的「土花」、「枯槁」、「脫砂」等，點出奇險派常被側目之怪誕面貌，又逐一說明其值得細味之質地，一如方世舉批點李賀詩集亦稱揚四家：「一入人耳，洗盡常調。」<sup>35</sup> 強調奇險派之非凡價值。

再者，除了前述之並論杜、韓，方世舉又以數則詩話，個別申論奇險詩家之特點，如評孟郊曰：

及第後，變而入於昌黎一派，乃妙，且有昌黎所不及，比兩人〈秋懷〉可知也。東坡全目之為苦蟲風味，誠苦矣，得毋有橄欖回味耶？余少不知，

380。

<sup>35</sup>（清）方世舉：《方扶南批本李長吉詩集》，收於（唐）李賀著，（清）王琦等評注：《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 292。

老乃咀嚼之。（頁 781）

以孟詩受韓愈影響的奇險風格方為妙境，甚至有韓愈不及的傑出表現。但如此盛讚恐與詩壇對孟詩的評價牴牾，<sup>36</sup> 故方世舉提及宋代蘇軾（1037-1101）以孟詩全是苦澀怪味，如蘇軾之「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等，<sup>37</sup> 以孟詩之苦寒冷調皆出自肺腑，彷彿嚴冬蟲鳴不如擱置不讀。然而方世舉卻以此苦比作橄欖，耐咀嚼而回甘，並藉由自身經驗，以孟詩需有人生歷練方能品味孟詩，將孟郊於「『郊寒』島瘦」之世俗評價，提升至具有豐富層次之高境。

在奇險詩派中，盧仝（號玉川子）大抵如「其詩古怪」<sup>38</sup>、「盧仝奇怪」<sup>39</sup>，乃至「詩家評盧仝詩，造語險怪百出，幾不可解」等，<sup>40</sup> 可謂「怪」字之代表，可方世舉則為盧詩申辯：

然未嘗怪也，〈月蝕詩〉，退之小減字句，以為效作而入己集，豈漫然耶！王弼州斥之為醉人說夢，特弼州醉夢耳。……大抵胸有經術而貌為詭詞，不然，何至方正如退之，而津津稱道一異端之玉川先生哉！（頁

<sup>36</sup> 除了下文蘇軾所述，詩壇評孟郊不像方世舉這般正面，如宋代嚴羽曰：「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見氏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3年），詩評，頁181。劉克莊亦云：「孟生純是苦語，略無一點溫厚之意，安得不窮？」見氏著，王秀梅點校：《後村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後集卷1，頁50。均以孟詩過於苦澀，缺乏詩歌應有的溫厚韻味。至於韓、孟詩高下，明代許學夷則評有：「東野實不足於濤。……無退之之才，故終不足於濤。」見氏著：《詩源辨體》，卷25，頁257。以孟郊之才不比韓愈，故其詩難如韓詩壯闊。

<sup>37</sup> 詩句均出自蘇軾〈讀孟郊詩二首〉，見氏著，張志烈等主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卷16，頁1643、1645。

<sup>38</sup>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9，頁536。

<sup>39</sup> （元）吳師道：《吳禮部詩話》，收於吳文治主編：《遼金元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2254。

<sup>40</sup> （明）朱承爵：《存餘堂詩話》，收於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第2冊（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頁1216。

782)

先是反駁素來盧詩為「怪」之說，並對明代王世貞（1526-1590，號弇州山人）所貶之「病熱人嚙語」、「乞兒博酒食」等，<sup>41</sup>反斥責為妄言。蓋因方世舉認為盧詩僅是假託怪語，實則胸懷經緯，故韓愈這般方正之士才會盛讚盧仝，乃至仿作盧詩，均可見方世舉極力澄清盧詩不應流於「怪」之表面評價。

至於奇險派另一名人李賀，方世舉先是稱其「體體皆佳」（頁 781），呼應批點李詩所稱：「通集自以七言歌詞為最，盡人所知也，五律、五排、五絕亦復妙絕。」<sup>42</sup>近似杜甫之諸體兼善，還進階讚揚：

大抵學長吉而不得其幽深孤秀者，所為遂墮惡道。義山多學之，亦皆惡；宋、元學者，又無不惡。佶然以生，瞿然以清，謂之為鬼不必辭，襲之以人卻不得，直是造物異撰。……杜牧序中引昌黎諸比擬語，足以為嘔出心肝者慰。（頁 781）

因李賀常以豔麗造語談論鬼神，故有「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sup>43</sup>、「賀乃魔耳，魔能魅悶迷人」等負評，<sup>44</sup>後世又不乏追摹效仿者，但就方世舉而言，像李商隱或宋、元人等不善學者已墜惡道，蓋因方世舉以李賀自有幽深孤秀，乃天地間獨此一人，並非徒具表象之駭目詭語，一如宋人嚴羽（？ -

<sup>41</sup> 方世舉所謂的「王弇州斥之為醉人說夢」，當指王世貞評曰：「玉川〈月蝕〉是病熱人嚙語，前則任華，後者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點名盧仝〈月蝕〉為夢話，更認為盧仝詩往往如乞丐討酒食所唱，貶斥意味濃厚。見氏著：《藝苑厄言》，收於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卷 4，頁 1011。

<sup>42</sup> （清）方世舉：《方扶南批本李長吉詩集》，頁 291。

<sup>43</sup> （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收於（清）何文煥：《歷代詩話》，卷 1，頁 455。

<sup>44</sup> （明）陸時雍：《唐詩鏡》，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5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47，頁 1。

1245) 云：「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sup>45</sup> 體現李詩之匠心獨具。

還可發現，像是方世舉點出韓愈等人之比擬語，以見李賀作詩嘔心瀝血，又評孟郊之「入於昌黎一派，乃妙」、盧仝之「方正如退之，而津津稱道」等，顯然方世舉論奇險派往往提及韓愈，不僅是藉以為相關詩人背書，更已然形成因宗主杜甫到並論韓愈，再到提升相關詩人之脈絡。背後所揭示者，很可能即是方世舉基於杜詩之萬變到韓詩之創新，乃至孟郊之苦、盧仝之怪、李賀之詭亦罕見如「龍肝鳳髓」而新穎奇特，可謂貫徹方世舉「唐詩亦有變」之重「變」詩觀。

### 三、方世舉宗杜、韓之緣由

方世舉論詩以杜甫為核心，又屢屢體現韓愈之價值，乃至反轉或抬升相關詩人的評價，形成如蔣寅所謂：「方世舉更發展了韓愈研究，而且與杜詩相接合。」<sup>46</sup> 這也透露方世舉是在原有的尊杜基礎上，有意識納入韓愈。這般詩學宗尚自非一朝一夕建立，涉及方世舉之背景經歷，可分為「家學淵源」、「師從朱彝尊」以及「時代風潮」幾個面向，以下即論述之。

#### (一) 家學淵源

方世舉論詩乃全方面盛讚杜甫，重視程度可見一斑，而此尊杜思維應是早年即奠定，如方世舉自述：

余家傳詩法多宗老杜。明初，先斷事公殉建文之難，有絕命詞五律二首，所謂「死豈論官卑」者，已是杜〈初達行在〉之沉痛。至先太僕公好為七律，全得〈秋興八首〉之鴻音壯采。先宮詹公又集學杜之大成，晚而批杜，章法、句法、字法皆有指授。（頁 772）

<sup>45</sup>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詩評》，頁 181。

<sup>46</sup> 蔣寅：〈方氏詩論與桐城詩學的發展〉，頁 691。

方家論詩歷來以杜爲尊，先祖所作亦多有杜詩風采，明示家學宗杜的影響與成效。而後，方世舉稱揚曾任太子詹事的曾祖父方拱乾，<sup>47</sup> 不僅學杜有成，更批註《杜詩論文》指授字句章法，亦即曾紹皇所謂：「方拱乾批閱杜詩之目的在於『批以訓小子者』，這是其家學傳統所在。」<sup>48</sup> 方拱乾明確以批杜指點後輩，體現了方氏家族學杜的傳統。

既是家學宗杜，故除了先祖之仿作與批註，又如方世舉指出：

望溪兄、宜田姪實確守之，兄以文勝而詩居功半，今藏於家；姪則表見於世矣。（頁 772）

方家子孫如方世舉之族兄方苞、姪子方觀承皆傳承宗杜觀。有趣的是，方苞在清代應是以古文聞名，且如清人朱庭珍（1841-1903）曰：「本朝古文家，……靈皋方氏，則終生不能作（詩）矣。」<sup>49</sup> 方苞並未於詩壇有一席之地，然而方世舉卻稱方苞古文成就亦有學杜詩之助益，只是詩作未公開故不如古文聲名遠播。固然此說或可議，但也體現了方世舉欲強調學杜爲家族共同的童蒙基礎。

至於詩名「表見於世」的姪子方觀承自深受杜詩影響，而當方世舉評價其詩，亦是以杜甫爲標竿，如其曰：

誦前軍中五律十數首，時余臥矣，……不覺決然起，拍其肩背：「子欲抗高、岑塞上作，直入杜〈秦州雜詩〉耶！」（頁 771）

<sup>47</sup> 此據清代馬其昶考述：「兩先生（方世舉、方貞觀）皆少詹事坦菴曾孫，……坦菴諱拱乾，字肅之，崇禎時官少詹事。」見氏著：《桐城耆舊傳》（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傳7，頁33。可知方世舉及堂弟方貞觀皆為方拱乾之曾孫。

<sup>48</sup> 曾紹皇：〈桐城方氏父子手批《杜詩論文》的文獻價值及理論意義〉，《文獻季刊》2011年第1期（2011年1月），頁137。

<sup>49</sup> （清）朱庭珍：《筱園詩話》，收於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卷2，頁2351。

從驚坐起身表現對姪子的欣賞，又稱其詩不僅可與高適、岑參等邊塞詩人匹敵，甚至已窺見杜詩妙境，說明了方家人以「直入杜詩」為更高的品鑑指標。

除了方世舉所論者明見其家法宗杜，又有像同為方拱乾曾孫之方貞觀，當方世舉主張「今日學詩，惟有學唐」（頁 771），從弟方貞觀在其詩話《輟鍛錄》亦直指「余獨以唐人為歸」之尊唐，<sup>50</sup> 又稱揚杜甫：

體製惟七律最難，須五十六字無一牽湊，……尤忌刪去兩字便可作五言詩讀。欲除諸病，惟熟讀少陵及大曆諸名家，則得之矣。<sup>51</sup>

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非奇險怪誕之謂也，或至理名言，或真情實景，應手稱心，得未曾有，便可震驚一世，子美集中，在在皆是。<sup>52</sup>

方貞觀與方世舉同將七律視為難度最高之體，只是不同於方世舉藉由「杜之四科」來引導，方貞觀則同舉杜甫及大曆詩人為典範，但尊杜立場仍是一致；如同方貞觀將杜詩奇險多變的一面亦視為至理或真情，顯然在桐城方氏的宗杜教育下，方世舉與族人確實均秉持尊杜觀。

雖說方家明以杜詩為宗，但方世舉另外推崇的韓愈一派，似乎與方氏家學並無關聯。不過透過方世舉的記述可知，像是方世舉與方苞論詩：「余與望溪兄五古所謂『大兒李杜韓，小兒王孟柳』。」（頁 774）將韓愈五古提升至等同李、杜之高位。又如方世舉評韓愈七古〈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所云：

詩不過秋燒耳，遂曼衍詭譎，……亦遊戲已甚矣，但藝苑中亦不可少此一種瑰寶。先宮詹為門生子姪之為翰林者，選《玉堂詩論》一書，又取〈董生行〉一首，而此詩亦不遺，卻不加點，似默喻以審乎才學。（頁 775）

<sup>50</sup> （清）方貞觀：《輟鍛錄》，頁 1937。

<sup>51</sup> 同前註，頁 1941-1942。

<sup>52</sup> 同前註，頁 1944。

方世舉並不諱言韓愈此詩遊戲極矣，蓋因能如此戲作更彰顯才華。爲了進一步證明韓詩之價值，方世舉又舉方拱乾爲晚輩所選《玉堂詩贈》，書中同樣收錄此首及韓愈〈嗟哉董生行〉，提點後生留意詩人才學。顯然桐城方氏對韓愈之關注，早在方拱乾、方苞等人已見端倪，而後方世舉再藉由並論「杜、韓二家」，揭示韓詩亦有企及杜詩之價值。

## （二）師從朱彝尊

方世舉除了因家學淵源而推尊杜甫，不過族弟方貞觀在尊杜之餘，卻評價：「若李長吉，必藉以驚人，此魔道伎倆，正仙佛所不取也。」<sup>53</sup>直斥李賀之瑰辭險語爲邪魔歪道；又如姪子方觀承「宜田論詩，獨不喜怪，怪如盧仝，想所屏棄」（頁 782），亦對盧仝之怪詩反感棄置，迥異於方世舉因韓愈而推崇李賀、盧仝等人。但方世舉又因何重視韓愈？可先從求學歷程來看，如其曰：

初從朱竹垞先生遊，值友人顧俠君《箋注昌黎詩集》新出，凡宋人有說皆收之，用力勤矣。而諸說於昌黎身世，多有不合。少年率爾，遂貿貿指摘於先生前，先生不責而喜之，且慫恿通考，以爲異日成書。此余爲《韓詩編年箋注》所自始也。（頁 770）

除了方氏家學，方世舉還曾隨朱彝尊（1629-1709，號竹垞）學習，對應《蘭叢詩話》之「余少學朱竹垞先生家」（頁 769）、「昔問之竹垞先生」（頁 779）等多次追憶，可見這段師從經驗對方世舉相當重要。藉由回顧往事的視角可知，方世舉接觸韓詩的契機不單只是友人註本多所訛誤，在方世舉檢討自己的年少輕狂時，也側寫了朱彝尊積極鼓勵的良師樣貌，可謂是老師「慫恿通考」不斷引導，才促使方世舉敢於走向箋註韓詩。

至於朱彝尊本身除了以導師身分勸勉學生，亦曾批點韓詩且讚揚之，<sup>54</sup>像

<sup>53</sup> （清）方貞觀：《輟鍛錄》，頁 1944。

<sup>54</sup> 朱彝尊著有《批韓詩》，惜未於坊間流通。筆者可見者（唐）韓愈撰，（清）顧嗣立補註：

是：

只就一時所見光景寫入骨髓，無所因襲，亦不強置，鑿空撰出，真趣宛然，後鮮能繼者。<sup>55</sup>

仍是〈陸渾山火〉、〈苦寒〉一派語法，……佳處亦在生硬。<sup>56</sup>

大抵稍涉散文氣，昌黎以文為詩，是用獨絕。<sup>57</sup>

以韓愈捕捉到的眼前光景創新而有真趣，後人難以為繼；又指出韓詩之佳處即在生澀不流暢；尤其對於韓愈涉入散文寫法之「以文為詩」，朱彝尊與方世舉不僅同樣持肯定觀點，而且朱彝尊所稱之「獨絕」、「無所因襲」等語，也是對韓詩獨特創造力予以認可。

再者，像朱彝尊所評之「佳處亦在生硬」，已然讚賞奇險派的艱澀用筆，其他又有像「是拗排律，全不費力，然意味卻有餘」<sup>58</sup>、「意新語奇，則故為生硬」等，<sup>59</sup>稱其拗體有味或是刻意新奇，一如方世舉論韓詩所云：「曼衍詭譎，……但藝苑中亦不可少此一種瑰寶。」亦以奇險派為詩壇瑰寶，當有一席之地；乃至方世舉論奇險詩人還有明顯受朱彝尊影響者，如其論孟郊曰：

---

《昌黎先生詩集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年），該書將清代朱彝尊、何焯之評合錄為眉批，序文註明：「硃筆為何義門批點，藍筆為朱竹垞批點，依原本錄焉。」見卷前序，頁1。然而臺灣學生書局出版僅以黑白影印，無法辨別何者為硃筆或藍筆，故筆者轉引根據朱彝尊原本、顧嗣立硃墨本之（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集釋本之徵引說明見附錄，頁1374、1383。

<sup>55</sup> 同前註，〈李花二首〉，卷7，頁831。

<sup>56</sup> 同前註，〈辛卯年雪〉，卷7，頁825。

<sup>57</sup> 同前註，〈殘形操〉，卷11，頁1245。

<sup>58</sup> 同前註，〈縣齋讀書〉，卷2，頁204。

<sup>59</sup> 同前註，〈感春四首·其二〉，卷4，頁391。

誠苦矣，得毋有橄欖回味耶？余少不知，老乃咀嚼之。昔聞竹垞先生稱其略去皮毛，孤清骨立。……今愧悔之。（頁 781）

所謂的孟詩太過苦澀，老師朱彝尊早已點明品鑑重點在於含藏的孤清風骨，而後方世舉隨年歲增長，確實也漸能領會奇險詩耐人咀嚼之精髓。

此外，方世舉在談論韓愈「曼衍詭譎」的奇險詩時，亦曾申明：

韓詩不可專學，……畢竟是高才而後能戲，亦始可戲。要之還要博學，博學不是獼祭，獼祭終有痕跡。手不釋卷，日就月將，不待招呼而百靈奔赴矣。（頁 775）

韓詩能以險怪戲作，除了具備出眾才華，還必須積累學問且融會貫通。可見方世舉肯定奇險派，並非眩目於字面新奇，而是知曉其乃天賦與後天勤學的結合，故方世舉強調「不可專學」韓詩，一如抨擊不善學李賀者墮入惡道，又稱揚盧仝詩內在胸懷經緯，乃至叮囑韓、孟聯句「無篇不奇，無韻不險……，然萬不可學」（頁 781），之所以能行奇字險韻，均源自詩人們勤學磨練而成佳篇，故不可單純模擬這些奇險詩之表面。

方世舉如此重視學問，也應是受朱彝尊影響，如後者著名主張「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sup>60</sup>「予故論詩必以取材博者為尚」等，<sup>61</sup>皆力倡博學，故而得趙執信（1662-1744）評價：

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濟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舉之，是真敵國矣。……朱貪多，王愛好。<sup>62</sup>

<sup>60</sup>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卷 39，頁 10。

<sup>61</sup> 同前註，卷 39，頁 6。

<sup>62</sup> （清）趙執信：《談龍錄》，收於丁福保編：《清詩話》，頁 316。

詩壇並峙的王士禛、朱彝尊各以才華、博學見長，甚至因此被譏諷是過度執著佳句或學問。一如方世舉談創作觀亦云：「愚意兼之以《周易》象爻，《太玄》離測，尤足以廣人思路。」（頁 777）廣泛閱讀如《周易》、《太玄》等非直接關乎詩學之書籍，以求開拓創作思路。想來也是方世舉師承朱彝尊之重學觀點，進而強調奇險派之博學。

從朱彝尊批點韓詩，實可見對奇險派之肯定態度，不過韓愈仍非其最高詩學宗尚，一如朱彝尊提出：

撫韓、杜韻語以為詩材，正正奇奇，各得其所宜，其詩之日進于格也已。<sup>63</sup>

除了將韓愈與杜甫之詩同視為後學的榜樣，若進階細究朱彝尊所批韓詩，杜甫的地位往往更勝一籌，如其曰：

微加藻潤，營構猶有杜法。<sup>64</sup>

氣脈猶覺生硬，杜則渾然。<sup>65</sup>

亦本杜詩來，第中間著力不得處稍遜杜。<sup>66</sup>

無論是肯定韓愈布局宛如杜甫，或是渾成不比杜詩，還是根源杜詩而仍有不及者，顯然朱彝尊的評點乃以杜甫為核心，這也如方世舉所謂「今日學唐，惟當學

<sup>63</sup>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6 冊，卷 39，頁 8。

<sup>64</sup>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寒食日出游夜歸張十一院長見示病中憶花九篇因此投贈》，卷 4，頁 389。

<sup>65</sup> 同前註，〈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卷 3，頁 325。

<sup>66</sup> 同前註，〈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卷 8，頁 959。

杜」(頁 771)之最高準則，顯然朱、方師生都是基於尊杜而論及韓愈等其他詩家。

### (三) 時代風潮

方世舉在《蘭叢詩話》確立其詩學觀已為晚年，故除了早期受家學與師從的直接影響，自不免有時人時代的間接影響，一如方世舉自序：

余聊以所聞於師授及與羣從所往復者，舉示兒輩。(頁 769)

作為引導後輩之《蘭叢詩話》，即是結合方世舉受朱彝尊指點及與朋輩論詩之精要，並非方世舉閉門造車。加以《蘭叢詩話》之成書過程為：

康熙末，留都下者十年，諸翰苑之初為布衣交者，不時過從，談詩為事，……以為《梁園詩話》，……不復知所錄猶在人間否也？(頁 770)

詩話總說不盡，……一氣疾書，擲筆而止，時年八十五矣。(頁 784-785)

最初的《梁園詩話》雖已散佚，仍可見方世舉早在康熙朝即與人談學往來。最終在乾隆 24 年(1759)定稿《蘭叢詩話》，且據馬其昶(1855-1930)所考：「(方世舉)年八十餘，猶於廣座中伸紙濡墨，頃刻賦數十篇，精采不少減。」<sup>67</sup>其晚年仍持續與外界文士交流。可推測方世舉論詩亦當有康、雍、乾三朝思潮之縮影。

早在明末清初之時，部分文人不滿於明代前後七子「詩必盛唐」之狹隘復古，轉而關注中、晚唐乃至宋詩，形成或尊唐或宗宋之思潮，像是康熙朝領袖王

---

<sup>67</sup> (清)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卷 7，頁 34。

士禛《古詩選》以宋代蘇軾詩為全本之冠，<sup>68</sup>但後來又有《唐賢三昧集》專宗盛唐詩。而在方世舉《蘭叢詩話》中，即有徵引王士禛者，如其曰：

王新城教人少作長篇，恐其傷氣，是也。（頁 774）

宋七絕多有獨勝，王新城《池北偶談》略采之。（頁 779）

既認同王士禛以長篇文氣不易掌握之說，而且像方世舉藉王士禛著作以抬高宋人絕句者，亦可見方世舉雖明言「惟有學唐」，也並非全然不關注其他詩歌。

至於《蘭叢詩話》之核心杜甫，方世舉的觀點確與時人相近。尤其在評價兩極的絕句，明末徐增（1612-1671）即盛讚杜甫五絕：「如是曲折，非子美不能也。」<sup>69</sup>清初葉燮（1627-1703）更論有：

杜七絕輪困奇矯，不可名狀，在杜集中，另是一格，宋人大概學之。<sup>70</sup>

認為杜甫七絕奇特曲折，還影響宋人創作；而後評杜名家浦起龍（1679- 1762）同樣稱其「直開宋、元家數」等。<sup>71</sup>對此，方世舉也確實主張：「杜獨變巧而為拙，變俊而為儉，……宋七絕多有獨勝。」（頁 779）以絕句定式始由杜甫創新，宋人又延續此變化特出。

<sup>68</sup> 據筆者統計王士禛《古詩選》共選詩 1541 首，蘇軾詩 104 首為全本之冠，其次為韋應物 80 首，再次為陸游 78 首等。見氏著，（清）聞人倓：《古詩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另，據此書出版說明：「《古詩箋》是清聞人倓據王士禛《古詩選》箋注的一部五、七言古詩讀本。」（卷前「出版說明」，頁 1），可知王士禛選本原名《古詩選》，聞人倓僅增添箋註，未對原書刪減，而本文所論乃以王士禛為主，故仍稱《古詩選》，以免誤認王士禛另著有《古詩箋》，至於註腳格式則依上海古籍出版社之書名「古詩箋」標示之。

<sup>69</sup> （明）徐增：《而庵說唐詩》，轉引自陳伯海：《唐詩彙評》，頁 1243。

<sup>70</sup> （清）葉燮：《原詩》，外篇下，頁 610。

<sup>71</sup>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 年），卷 6 之下，頁 841。

再者，《蘭叢詩話》定稿於乾隆朝，方世舉所宗尚的杜、韓二家亦貼合時流，像是乾隆詩壇領袖沈德潛（1673-1769）即主張：

杜工部沉雄激壯，奔放險幻，如萬寶雜陳，千軍競逐，天地渾奧之氣，至此盡洩，為一體；……韓文公拔出於貞元、元和間，踔厲風發，又別為一體。七言楷式，稱大備云。<sup>72</sup>

不僅於七古並論杜、韓，還格外舉其雄偉氣勢；如同方世舉屢屢論及杜、韓二家之古詩益見力量。

更甚者在於乾隆 15 年（1750），由官方刊定御選《唐宋詩醇》，<sup>73</sup>專錄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蘇軾、陸游（1125-1210）六家，融合盛、中唐及宋詩；對照方世舉最推崇者，亦是盛唐杜甫與中唐韓愈，並有「退之又創新，然而啓宋矣」（頁 779），同樣涉及韓詩對宋人之啓發。乃至方世舉《蘭叢詩話》雖是以唐詩為尊，仍時而論及：「東坡亦未必逼真古人，卻是妙絕時人。」（頁 779）方世舉高舉於宋人之上的蘇軾，不僅同受御選《唐宋詩醇》關注，還如王英志等人指出：

杜、韓、蘇三人是唐型詩向宋型詩轉變中的三次轉化，而且，宋人最推崇的唐代詩人就是杜、韓。<sup>74</sup>

官方欲以御選本調和尊唐與宗宋，也間接認可從盛唐到中唐、再到宋人的轉變軌跡，而方世舉最推舉的杜甫、韓愈，乃至宋代蘇軾，即是這些變化過程的關鍵人物；甚至在方世舉論及杜甫「獨變」、韓愈「創新」等，多次強調詩歌之變化

<sup>72</sup>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卷前凡例，頁 2-3。

<sup>73</sup> 乾隆皇帝序曰：「乾隆十五年庚午夏六月既望四日御筆。」見（清）清高宗御選：《唐宋詩醇》（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年），卷前御製序，頁 3。

<sup>74</sup> 王英志主編：《清代唐宋詩之爭流變史》，頁 515。

性，亦可謂與當時重「變」思潮相應的結果。

要之，方世舉早在童蒙時的家傳詩法，即已建立尊杜觀；後又受老師朱彝尊的影響，體認到韓愈及奇險派詩人的獨創價值；至於方世舉所處之清初至盛清時代，亦是從盛唐逐漸關注至中、晚唐，乃至宋詩，尤其像方世舉所宗尚之杜、韓二家，更是備受官方詩學推崇，故而方世舉即在種種學詩歷程與思潮影響下，逐漸從尊杜之最高原則中，發展出並論杜、韓，以及留心相關詩人。

#### 四、方世舉宗杜、韓開桐城詩學師法之先

清初文人方世舉著有《蘭叢詩話》、《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等詩學專書，並大力推崇杜甫、韓愈之詩，補充了桐城派初期往往被認為不發達的詩論。此外，方世舉對於杜、韓二家之宗尚，還可謂後來桐城詩派在師法對象的先導。至於具體又是哪些詩論與之後的桐城詩學有關？以下即申論之。

首先，方世舉在桐城派的定位即以詩名世，如受業於晚清桐城名家吳汝綸（1840-1903）的馬其昶（1855-1930）《桐城耆舊傳》曰：

其後方氏以詩名尤著者二人，一曰南堂先生，諱貞觀，……一曰息翁先生，諱世舉，字扶南，著（著）《春及堂詩集》二卷、《江關集》一卷。<sup>75</sup>

在梳理前賢譜系時，介紹方世舉和方貞觀的引言即是「方氏以詩名尤著者」。而後金天翮（1873-1947）亦記載：「文章莫若苞，而詩之有聞者，文與貞觀、世舉其尤也。」<sup>76</sup> 若說同輩之中，方苞無疑是聲名顯赫的古文家，方世舉便是詩歌領域的代表人物之一。

<sup>75</sup> （清）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傳7，頁33。

<sup>76</sup> 金天翮：《皖志列傳稿》，收於《中國古代地方人物傳記匯編》第79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卷2，頁11-12。

方世舉的詩學著作也受到桐城後人關注，如姪子方觀承為其記述：「晚年注韓，遂酷嗜之。」<sup>77</sup>馬其昶亦載曰：

息翁先生……，酷嗜（嗜）韓詩，為《韓詩編年箋注》十二卷。<sup>78</sup>

顯然方世舉箋註韓詩而酷愛之，皆為桐城後人熟知，甚至像清末民初的高步瀛（1873-1940）《唐宋詩舉要》，援引《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達 24 則之多，相當肯定其鑽研韓詩之功力。

至於在具體詩論中，桐城後人的看法更普遍與方世舉相應。像是方世舉最為核心的尊杜觀，固然如程維所述：「桐城派作家人人皆讀的一部書，那便是杜詩，桐城派作家幾乎都是杜詩的忠實擁躉。」<sup>79</sup>桐城派已有尊杜共識，不過方世舉在《蘭叢詩話》提出「今日學唐，惟當學杜」（頁 771），其核心更在於「學習」杜詩。以此對照方東樹〈通論七律〉列舉：「學於杜者須知其言高旨遠，一也；……沉著往來，不拘一定而自然中律，四也。」<sup>80</sup>吳闈生（1878-1949）《古今詩範》也提及：「諸生但患不能及杜耳，……學也者，效法之謂也。」<sup>81</sup>都是以學杜為指導之要。再者，方世舉為能引導學習，於最困難的七律還點名白居易、李商隱等「杜氏四輔者」（頁 779），在方東樹《昭昧詹言》亦有：

今定七律以杜七律為宗，而輔以文房、大歷（曆）十子、並取義山之有魄者而去其魄多者。<sup>82</sup>

<sup>77</sup>（清）方觀承：〈春及堂集序〉，收於（清）方世舉：《春及堂集》，頁 1。

<sup>78</sup>（清）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傳 7，頁 33。

<sup>79</sup>程維：〈清前中期桐城杜詩閱讀傳統與桐城義法的生成〉，《文學遺產》2023 年第 6 期（2023 年 11 月），頁 45。

<sup>80</sup>（清）方東樹：《昭昧詹言》（臺北：廣文書局，1962 年），卷 14，頁 6。

<sup>81</sup>吳闈生：《古今詩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 年），卷前講義，頁 3。

<sup>82</sup>（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 18，頁 2。

雖改從劉長卿（726-790）、李商隱等人取徑，不過對於以杜甫為七律冠冕，並藉由其他詩人登堂入室，方世舉、方東樹欲為後學建立學杜路徑的理念均是一致。

只是不同於杜詩，韓愈七律並未受到方世舉青睞，甚至還被評為：

施諸廊廟之詩，尤宜平易。……韓昌黎、張文昌亦有此題七律，則寒儉粗疏。（頁 783-784）

以韓愈應制七律粗疏不佳。後來桐城派選本如姚鼐《今體詩鈔》、曾國藩（1811-1872）《十八家詩鈔》也未錄韓愈七律。即便有吳闈生選其 2 首，仍格外說明：「韓公古體光怪陸離，無奇不有；律詩似少佳製，錄此二首，聊存梗概云。」<sup>83</sup>以韓愈古詩新奇，律詩則少佳作，僅存參而錄之。顯然方世舉與桐城後人對韓愈擅長古體而不工七律的看法，也是相當一致。

桐城詩學更明確與方世舉接軌的觀點，當在《蘭叢詩話》所述：

五古所謂「大兒李杜韓，小兒王孟柳」，言氣勢也。（頁 774）

在方世舉所處的時代，如王士禛、沈德潛等詩壇領袖依舊以杜、韓五古為變體，甚至王士禛《古詩選》五古全然不取杜、韓，唯七古才論及二家。<sup>84</sup>然而方世舉卻主張杜、韓五古之氣勢雄健，與李白均為大家，可謂新穎大膽的論調。而後，姚鼐亦對王士禛五古不選杜、韓提出：

<sup>83</sup> 吳闈生：《古今詩範》，卷 16，頁 14。

<sup>84</sup> 如王士禛《古詩選》五古不取杜、韓，七古則主張：「杜七言于（千）古標準，……貞元、元和間，學杜者唯韓文公一人耳。」見氏著，（清）聞人倓箋：《古詩箋》，卷前凡例，頁 4-5。又如沈德潛《唐詩別裁集》論唐人五古，在陳子昂、李白一派，及王維、孟浩然一派之餘，雖以杜甫「詩之變，情之正」另立一派，仍不免稱其變體，且未提及韓愈。見氏著：《唐詩別裁集》，卷前凡例，頁 2。

今若病其缺此大家，只當另選一杜詩，或益以昌黎，以待天下士才力雄健之者自取法可也。<sup>85</sup>

同樣建議五古應加選雄健之杜、韓二家。方東樹〈通論五古〉也認為：「杜、韓皆全是自道己意而筆力強，……惟大家學有本源，說自己本分話。」<sup>86</sup>已將杜、韓視作大家，並稱其筆力強勁，顯然都與方世舉的說法十分相近。

甚至在後來桐城派的詩歌選評中，如曾國藩《十八家詩鈔》於唐人五古僅錄李、杜、韓三家；又如吳闈生《古今詩範》、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各自論五古亦稱：

韓為李、杜後一大宗，學詩者未有不從韓公入手而能深造者。<sup>87</sup>

李、杜出而篇幅恢張，變化莫測，詩體又為之一變。韓退之排空硬語，雄奇傲兀，得杜公之神而變其貌。本編所錄，以三家為主。<sup>88</sup>

吳闈生將李、杜、韓均視為五古詩家之大宗，還鼓勵後人學習韓詩。高步瀛同樣盛讚李、杜之恢張與韓之雄奇，強調所選五古即是以此三家為要。可見後來的桐城詩派普遍高舉杜、韓五古，而早先提出「大兒李杜韓」的方世舉，可謂先行於此一論調之上。

對於杜甫、韓愈評價普遍不高的絕句，方世舉《蘭叢詩話》仍認為：「杜獨變巧而為拙，變俊而為儉，……然儉中之俊，拙中之巧，亦非王、李輩所有。……退之又創新，然而啓宋矣。」（頁 779）於絕句讚揚杜詩之餘，亦肯定

<sup>85</sup>（清）姚鼐：《惜抱先生尺牘·與陳碩士》，收於《叢書集成續編》第 130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 年），卷 7，頁 14。

<sup>86</sup>（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 1，頁 8-9。

<sup>87</sup>吳闈生：《古今詩範》，卷 5，頁 1。

<sup>88</sup>高步瀛：《唐宋詩舉要》（臺北：宏業書局，1988 年），卷 1，頁 1。

韓詩之創變。對照桐城派選本有收錄絕句詩體者，如曾國藩《十八家詩鈔》選杜甫七絕達 105 首之多；<sup>89</sup> 又如高步瀛《唐宋詩舉要》於絕句亦申明：

杜子美以涵天負地之才，區區四句之作未能盡其所長，有時遁為瘦硬牙杈，別餘風韻。……「錦城絲管」之篇，「岐王宅裡」之詠，較之太白、龍標，殊無愧色，乃歎賢者固不可測。<sup>90</sup>

高步瀛除了選杜甫絕句 7 首，當方世舉論杜詩是在儉拙中蘊含俊巧，高步瀛亦稱杜詩之瘦硬別有韻味，並且都藉由李白、王昌齡等名家聖手，襯托杜甫絕句獨有的風采。同時，高步瀛也收錄韓愈絕句 2 首，體現了杜、韓二家確實都能兼擅絕句，遙相呼應方世舉對二家之肯定。

也因此，如程沖、方盛良就桐城方氏的詩學發展指出：

桐城方氏詩書傳家，於詩法上一脈相承，多宗杜甫。……從方世舉主宗杜甫亦辦香韓愈到方東樹多次「杜、韓」並舉可以看出，韓愈在方氏詩學觀中地位的逐漸上升。<sup>91</sup>

從方世舉首次在家法宗杜的基礎引入韓詩，到方東樹之時已慣於杜、韓並舉，可見方世舉確實在家學詩法具有承先啓後的重要性。而且除了方氏一族，當整體桐城詩派如王英志等人綜述：「桐城詩派的唐宋兼宗，就主要體現在以唐之杜、韓，宋之大家為主要宗尚對象。」<sup>92</sup> 主張唐宋融合的桐城詩派同樣十分推崇杜

<sup>89</sup> 《十八家詩鈔》固然為總數 6599 首的大部選本，但像李白七律、白居易五古不錄，於王維僅取五律、李商隱僅取七律等，可知曾國藩對各家自有偏重的詩體，如今選杜七絕百首以上，亦可謂對杜甫此體之認可。見（清）曾國藩纂，（清）李鴻章審定：《十八家詩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

<sup>90</sup>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卷 8，頁 750。

<sup>91</sup> 程沖、方盛良：〈論桐城方氏的杜詩觀〉，頁 62。

<sup>92</sup> 王英志主編：《清代唐宋詩之爭流變史》，頁 479-480。

甫、韓愈，乃至如蔣寅指出：

方氏家傳詩學夙以杜甫為宗，方世舉更發展了韓愈研究，而且與杜詩相結合，……開啟了桐城詩學並宗杜、韓的師法宗旨。<sup>93</sup>

方世舉透過家學奠基與師從受教，逐漸形成宗尚杜甫、韓愈之詩論，可謂是桐城派在詩學師法杜、韓上的先驅者。

## 五、結語

作為清代文學流派之大宗，桐城派在文學史上往往被認為是由初祖方苞先開創古文理論，詩歌理論則至乾、嘉以後的姚鼐及其弟子方東樹始奠定。然而在郭紹虞所輯《清詩話續編》當中，卻收錄與方苞同族且同時的方世舉《蘭叢詩話》、方貞觀《輟鍛錄》，尤其在方世舉的詩論中，除了提倡尊杜學杜，又另外編纂著名的《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乃至酷嗜韓詩，方世舉可以說是將杜甫、韓愈視為最主要的宗尚對象。

細究方世舉對杜、韓之推尊，是基於以杜詩為最重要的學習指標，藉由多次並論杜、韓二家，將韓詩的關注度大幅提高，又援引杜詩為韓愈之以文為詩、不工絕句等負面評價逐一平反。此外，方世舉還將韓愈的奇險詩上溯至杜甫，下及孟郊、盧仝、李賀等相關詩人，形成一條以創變為主的詩歌發展脈絡，極力宣揚韓愈一派在詩壇上的重要價值。

只是當方世舉建議後學五言從王維、孟浩然入手，七律先就劉禹錫、白居易等人學習，以期最終能企及杜詩聖境，顯然都是基於引導後人學杜的視角而論。但是方世舉對於積極褒揚的韓愈等人，卻一再強調無其才學不可效仿。這些主張之所以複雜如斯，蓋因方世舉的詩學觀是建立於多重因素的影響之下，從桐城方

---

<sup>93</sup> 蔣寅：〈方氏詩論與桐城詩學的發展〉，頁 691-692。

氏歷來家傳詩法宗杜，即為方世舉尊杜觀之始；而後，方世舉跟隨清初大儒朱彝尊學習，在同樣推崇杜甫之餘，也從重視學問培養對韓愈一派的興趣。甚至在方世舉所處之清代不僅詩學鼎盛，還逐漸從尊盛唐、尊杜之思潮中，向外關注到像中唐韓愈，乃至受杜、韓影響之宋詩。這些因素都導致了方世舉在尊杜的核心概念中，又融入韓愈與相關的奇險詩派。

也因此，除了方世舉在桐城後人的記述裡，本就以詩歌聞名，對於韓詩之偏好、所著的韓詩箋註，也都受到桐城後學的注意。至於方世舉於《蘭叢詩話》、《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闡揚的詩學理論，更可謂扭轉桐城派初期不工詩論的普遍說法。再者，進階對照後來的桐城詩派可知，方世舉在提倡學杜應有路徑、以杜韓為五古大家，乃至肯定杜韓絕句等多項論調上，也都與桐城後學的看法密切相關。此亦如蔣寅指出，方世舉在詩論中對杜、韓二家極力推崇，已然為桐城詩學在師法對象上的先驅者。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唐)李賀著，(清)王琦等評注：《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唐)杜甫著，(清)楊倫：《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註：《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唐)韓愈撰，(清)顧嗣立補註：《昌黎先生詩集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年)。
- (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 (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收於(清)何文煥：《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宋) 劉克莊著，王秀梅點校：《後村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宋) 劉攽：《中山詩話》，收於（清）何文煥：《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宋)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3年）。
- (宋) 蘇軾著，張志烈等主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元) 吳師道：《吳禮部詩話》，收於吳文治主編：《遼金元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
- (元) 劉壘：《隱居通義》，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17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明) 王世貞：《藝苑卮言》，收於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明) 朱承爵：《存餘堂詩話》，收於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第2冊（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
- (明) 金聖嘆：《金聖嘆選批杜詩》（臺北：德興書局，1981年）。
- (明) 胡震亨：《唐音癸籤》（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 (明) 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明) 高棅：《唐詩品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明) 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辨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
- (明) 陸時雍：《唐詩鏡》，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35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明) 楊慎撰，王大厚箋證：《升庵詩話新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清) 方世舉：《蘭叢詩話》，收於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 (清) 方世舉：《方扶南批本李長吉詩集》，收於（唐）李賀著，（清）王琦等

- 評注：《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清）方世舉：《春及堂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方世舉著，郝潤華、丁俊麗點校：《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
- （清）方貞觀：《輟鍛錄》，收於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 （清）方苞：《方望溪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
- （清）方苞撰，彭林、嚴佐之主編：《方苞全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
- （清）王士禛選，（清）聞人倓箋：《古詩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王士禛等：《師友詩傳錄》，收於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
- （清）王鳴盛著，汪鶴壽參校：《蛾術編》，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15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朱庭珍：《筱園詩話》，收於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宋犛：《漫堂說詩》，收於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
-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清）姚鼐：《惜抱先生尺牘》，收於《叢書集成續編》第130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
-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
- （清）馬其昶：《桐城耆舊傳》（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 (清)清高宗御選：《唐宋詩醇》（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
- (清)章學誠：《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
- (清)程學恂：《韓詩臆說》（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 (清)曾國藩纂，(清)李鴻章審定：《十八家詩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
- (清)葉燮：《原詩》，收於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
- (清)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收於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 (清)趙執信：《談龍錄》，收於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
- (清)趙翼：《陔餘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書

- 王英志主編：《清代唐宋詩之爭流變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
- 朱則杰：《清詩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 吳宏一：《清代詩話考述》（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年）。
- 吳闈生：《古今詩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
- 金天翮：《皖志列傳稿》，收於《中國古代地方人物傳記匯編》第79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 姚翠慧：《方望溪文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
-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臺北：宏業書局，1988年）。
-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陳伯海：《唐詩彙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 廖素卿：《方苞詩文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
- 趙建章：《桐城派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 蔣寅：《清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二) 期刊論文

- 丁俊麗：〈論方世舉的韓愈詩歌批評觀〉，《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 33 卷第 6 期（2016 年 11 月），頁 1-5。
- 郝潤華、丁俊麗：〈方世舉及其《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 27 卷第 3 期（2010 年 5 月），頁 1-5。
- 曾紹皇：〈桐城方氏父子手批《杜詩論文》的文獻價值及理論意義〉，《文獻季刊》2011 年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135-141。
- 程沖、方盛良：〈論桐城方氏的杜詩觀〉，《滁州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3 期（2022 年 6 月），頁 57-62。
- 程維：〈清前中期桐城杜詩閱讀傳統與桐城義法的生成〉，《文學遺產》2023 年第 6 期（2023 年 11 月），頁 45-57。
- 蔣祖怡：〈讀《蘭叢詩話》〉，《杭州大學學報》第 20 卷第 2 期（1990 年 6 月），頁 99-102。
- 蔣寅：〈方氏詩論與桐城詩學的發展〉，《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2 卷第 6 期（2014 年 11 月），頁 689-696。

(三) 學位論文

- 丁俊麗：《方世舉及其「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08 年）。
- 李小雨：《「韓昌黎詩集編年箋註」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12 年）。
- 鄭丹：《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註」研究》（成都：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2018 年）。

# **In the Early Tongcheng School, Fang Shiju Favored Du Fu and Han Yu in His Poetry Theory and the Reasons for this Preference — Also Discussing Their Pioneer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ngcheng Poetics**

*Cheng, Yi-Chua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Tongcheng School represents a major literary movement in Qing Dynasty literature. Traditionally, it has been viewed that the founder, Fang Bao, focused on establishing theories of prose rather than excelling in poetry. Contemporaries of Fang Bao, Fang Shiju gained renown for his poetry and authored treatises included in *Continuation of Qing Poetry Discussions*. Fang Shiju integrated the venerable reverence for Du Fu with Han Yu's poetry, pioneering the early admiration for both Du Fu and Han Yu in Tongcheng poetics. Currently, there is limited discourse on them.

Based on Fang Shiju's *Lan Cong Discussions on Poetry* and related works, it is evident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that Fang Shiju's core ideology was rooted in venerating the Tang poetry and Du Fu. He elevated their position the Du Fu and Han Yu, and also took interest in Meng Jiao, Lu Tong, and Li He due to Han Yu's influence. Fang Shiju's formation was shaped during his youth, and influenced by the times and environment. Fang Shiju also valued Han Yu, influenced in part by

the teachings of Zhu Yizun. Furthermore, Fang Shiju's emphasis on the Du Fu and Han Yu, elevating the five ancient poets and regulated verse, establishes him as a pioneer in shaping Tongcheng poetics. Thus, we could understand more of the early Tongcheng School's poetic and the connections with the later poetics.

**Keywords:** Fang Shiju, Du Fu, Han Yu, *Lan Cong Discussions on Poetry*, Tongcheng School of Poetry